

陕北

信天游依存的历史语境

——古代汉族与突厥民族的冲突与融合

■ 牛东梅、陈春轩(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



在本文涉及到的古代突厥民族(指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操突厥语的诸民族)——匈奴、敕勒、高车、回鹘、突厥等都是世代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现伊朗)、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1]的确,东至中国的东北以西,经中亚、里海以北,西至欧洲中部这一大片草原地带,繁衍生息着不同种落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的南部地区,平行存在着人类最早、最发达的农耕区域,以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最为典型。影响这两大不同经济发展轨道的根本原因是欧亚历史自然条件的差异。草原上的地理、气候条件只能采取畜牧、狩猎的经济生产方式,而南部湿润的平原,加上肥沃的土地更宜于农业生产。游牧与农耕这两种

不同经济生产方式长期共存,必然给这两个世界带来各种矛盾和融合,这就构成了从开始有游牧和农耕并存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北方正处于这一地域的东部,跨游牧和农耕两大经济类型区。因此,中国历史上北方农、牧民族的关系也是世界农、牧民族矛盾与交融的微缩。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他们或统治、或归附中原,无论称王还是为寇,都逐渐与汉民族完成了血胤的融合。其结果是对中原农业民族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游牧民族自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共存与交流。这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历史的进步。

中国操突厥语诸族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突厥人一直是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民族学界一致认为,公元6世纪以后封建经济开始萌芽,然而这仅仅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经济因素,并不是这个时期突厥社会典型的经济生产方式。公

元9、10世纪以后突厥社会才进入封建制的阶段。而这时的中原汉族地区已经走过了封建经济最鼎盛的时期。突厥与汉两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现出更加严酷的社会的差别,导致突厥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争夺,大多数时候是落后的突厥对汉的周期性掠夺。特别是,当突厥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两民族间经济的矛盾就上升为政治矛盾,有组织、大规模的战争就成为两个政治集团矛盾最集中的体现。今陕西北部一些城市、地区的名称还保留着历史上农牧民族战争的痕迹。绥德,取绥平扬德之意;靖边,取绥靖边疆之意;安塞,取安定边塞之意;定边,取底定边疆之意;延安,取延河流域平安宁静之意;还有历史上延州境内(现归子洲)的怀宁县、绥平县、克戎县、威戎堡等等。

长城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无数次战争的历史见证。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首先筑起了长城,并被后来的朝代多次修复或重建。从先秦时期到近代的两千年的时段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达到了修筑其目的本身无法触及到的层面。它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军事防御,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巩固发展过程中扮演的历史纽带,发挥着促进北方游牧民族与南部农业民族融合的历史作用。

“长城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又不可或缺的角色,形成了一条以自身来命名的民族融合带——长城带。作为长城民族融合的纽带,应是以这条长城为中,南北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它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国界线以内的辽宁、甘肃、陕西、河北等地。”^[2]长城两边农牧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融合凭借长城带逐步实现。因此这条以长城命名的经济文化枢纽区域就被学者们称为——长城文化带。

古代突厥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就是在长城文化带上完成的(关于古代突厥民族大批内迁以及落居今陕西北部的史实,笔者已在相关论文《陕北信天游的人地关系》中有详细分析)。在突厥民族与汉民族的杂居中,通婚是普遍存在的。学术界通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人类学家也认为血缘的融合才是最彻底的民族融合。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不同或较远的血缘相互通婚

可以产生更优秀的后代。其次从文化的角度，他文化的介入与交流会给原文化注入更鲜活的动力，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能保持更长久的生命力。族际间的通婚上至各民族各政权间的和亲，下至平民百姓间的结合，始终贯穿在突厥和汉民族的关系史中。突厥民族与汉民族的通婚，是两族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结果，也必然引发两族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更广阔的交流。

战争和通婚为民族的融合准备了条件，和平时期民族的长期共同生活是民族自然融合的过程，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的逐步发展才能使民族的融合顺利实现。从秦汉开始“长城民族融合带”正在逐步形成。但是，真正的两族长期和平的共同生活在明代以前并不突显。在笔者看来，突厥民族与汉民族间大范围的族际交融发生在明代以后至近代的大约600余年间。因为，元以前，中国北部疆界几乎就没有准确地划定过，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拉锯战”争夺的对象。中国当代民族学者称这一线域在明以前是“内边疆”地区。居住民以内附的游牧民族为主。生活风俗以及经济生产方式也以草原文化和游牧为典型。汉族人口大规模整居陕西北部地区始于明初，其目的是戍守边疆。汉族人大批入居陕西北部以后，变草原为粮田，迫使突厥人改变生活方式，真正融入到农耕文化里。长达6个世纪的突厥民族与汉民族的和平共处，足以完成两个民族从人种到文化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民族的融合与信天游的传唱基本出现在一个大致历史时段（有研究表明信天游的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元末明初），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信天游与突厥人之间的关系。

民族融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整合。按照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当两个民族相互接触时，特别是当两个民族文化力量有很大差异时，这种文化势能上的差异，往往会造成强文化势能对弱文化势能的巨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弱文化势能的民族接受强文化势能民族的文化。力量弱的文化可能被消灭、同化或后退萎缩并保留在狭小的特殊环境内。

^[3] 陕北地区民族文化的整合严格地遵循这条文化交融的规律。突厥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相互碰撞，显现出强烈的文化差异，定居民族的繁荣

经济吸引着逐水草而居的突厥民族。汉民族精神文化透露出的高远与凝重对刚步入封建社会不久的突厥人而言，更是深不可及。尤其是明代以后，汉民族人口大批迁往陕北定居，给历来是归附的游牧民族聚居区的陕北，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冲击。明代大学士刘珣在《新建榆林卫庙学记》中说：“榆林地，本春秋白狄所居，自秦迄今无所建制。入国朝永乐初，守臣奏筑营寨，集军望守……圣贤有像，祠祀有器，制度焕然，猗欤盛哉！……噫！穷边绝徼，学校郁郁乎可观如此，固不可言……今乃以文教，岂不曰吾儒之书所言仁义之言其所为教，则孝悌忠信之行也……”^[4]这篇“记”中，从先秦至明初叶对榆林地区的思想文化作了简要的描述，亦是历史进程中陕北地界文化发展的点滴脉络。明代汉族的住居带去儒家的文化传统，根植于陕北这块土地上，必然对当地的土著民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已经在陕北生活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游牧民虽然在明以后的600多年里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草原文化中尚勇健力的习俗不可能在中原文化移入后消逝殆尽。陕北直到今天还有以游牧为生的经济方式，仅这一点就可以证实，马上民族的后代无论从生存手段到文化模式还被完好地保存着。笔者的用意是，在今天陕北这块地方，近代以后形成的是汉民族，但是这个“汉民族”所涵盖的民族共同体意义与中原汉族有一定的区别。陕北人种有着明确的突厥民族的血统，尽管与汉民族融合，但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任何精神的“碎片”都不会因为与他民族发生血胤的融合而消失，它就像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河流，流经每一个突厥民族后代的心灵，灌注、塑造突厥民族的价值取向。后来的儒家文化的进入大多是在北迁的汉族人身上得到发扬和光大，对与突厥民族融合的汉族人同样产生影响，最后，对比较纯粹的突厥血统的人民仅仅是浅表性的作用。这就是今天看到的陕北人的性情不同于中原内地人的根源所在。这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整合的现象和结果。

综上所述，由于陕北信天游传唱人群和流传地区在历史上的复杂性、特殊性，本文从历史上两民族间的冲突带来的民族融合、文化整合这一视角来讨论

陕北信天游的依存语境。在笔者看来，信天游绝不仅仅是一个歌种，它已经代表了民歌文化的一种现象，笔者称它为“信天游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动因在于：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然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信天游不单单是在两个民族文化的交融下生成的，它应是多民族、多种文化基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按照文化的“纬向传播”^[5]说，与突厥语族诸民族共同生活的，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诸民族之间都有过历史与文化的接触。他们从东至大兴安岭经蒙古高原西达中亚这片广阔地带不断地扩展、移动，同时，他们的文化也在不断地相互作用和渗透，他们的民歌也必然地相互影响，这首先是草原文化不同脉系间的融合；其次，“长城文化融合带”的形成，标志着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互渗。因此，陕北地区的文化必定容纳了整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此外，曾经在陕北建立过，并持续了一百九十年之久的西夏国，他的建立者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古时“西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学者认为，今天陕北人中羌族血统占有大部分的比重，并且羌族民间音乐的调式在信天游的调式中有所反映。草原文化、长城带文化以及羌族文化与陕北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文化的“纬向传播”来解释。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纬向”关系的相互作用都会不同程度地促使、导致或影响今天陕北地区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所以，本课题仅仅是对“信天游现象”的提出，对于“信天游现象”的揭示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地思考与研究。笔者认为，诠释“信天游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信天游生存空间中不同历史民族的文化融合，才能透过现象走近信天游的本质。

参考文献：

- [1] 勒内·格鲁塞 [法] 著. 蓝琪译. 草原帝国 [M]. 商务印书. 2003
- [2] 李凤山. 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点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文史哲). 1996 (2)
- [3] 陈慧琳主编. 人文地理学 [M]. 科学出版社. 2002
- [4] 榆林市志 [Z].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5] 此说来自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学者赵复泉先生。